
附件 2， 關於“革命與改革——辛亥以來的百年中國（2012）”研討會主題

1. 總論

辛亥革命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顯學”。近 60 年來，中國大陸、臺灣與國際漢學界對辛亥革命和建立共和的研究，雖然幾經浮沉，但是，對這個領域的關注和研究興趣經久不衰。

自 21 世紀初十年來，中國大陸對此一方面的研究，明顯擺脫了過去的意識形態的束縛，在史料發掘和解讀方面進入“新階段”，相關研究成果增多。臺灣方面的研究依然維繫其學術風格，但是，國民黨撤離大陸時所帶去的檔案文獻，幾乎都已被充分利用，因而限制了研究創新的空間，研究規模呈現逐漸萎縮趨勢。在民進黨執政期間，以往幾乎每期刊發辛亥革命研究論文的《近史所研究集刊》，基本不再有臺灣學者的新研究論著發表；一些期刊開始刊載大陸作者關於辛亥革命的文章，填補相關的空白。臺灣的辛亥革命學術研究進入瓶頸區域。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際，海峽兩岸的官方與學界都予以高度重視，積極籌備各方面的紀念活動，包括一系列學術交流，紛紛開始籌畫新的學術研討活動，再次出現了辛亥革命的研究高潮。

在這樣的背景下，維也納大學在 2012 年初主辦“革命與改革——辛亥以來的百年中國（2012）”國際研討會，主旨是為中國海峽兩岸與國際學術界，提供一個平等交流、暢所欲言的學術講壇，以革命、改革為主線，通過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建立共和等重大歷史事件，以更為廣闊的視角，回顧、探討中國過去一百年來的轉型與變遷。在海外舉行此類學術研討會，具有一定的優勢，也是一種傳統。例如，1982 年 4 月在芝加哥舉行的“辛亥革命和建立中華民國：七十年後的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 34 屆年會特別會議）和 1991 年 8 月在檀香山舉辦的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學術會議均為學術佳話。相信，在海內外近現代史學界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下，此次研討會同樣會具有獨特的特點和意義，對此一方面的研究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和促進作用。

2· 研討會的重心

一般來說，研究這段歷史，無非是三種模式：其一，以當時的歷史事實為重心，去偽存真，補充新的史料；其二，用新的思想架構或理論范式重新分析、解讀；其三，以較為廣闊的視野，通過發掘、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遺產”，觀察事變之後所引發的中國新的歷史格局和走向，而且此一格局和走向始終是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直至今日。

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際，中國大陸和臺灣關於辛亥革命和建立共和的研究，基本屬於第一和第二種模式。所不同的是：臺灣方面更強調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統治，建立了共和體制中華民國，側重點是紀念中華民國成立 100 周年。目前，臺灣方面彙聚重量級學者在編寫《中華民國發展史》，試圖建立“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而大陸方面則淡化建國意義，仍舊主張重點紀念孫中山先生並反省其資產階級革命、民族獨立（國際關係）和現代化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

本次研討會則選擇第三種模式，在超越意識形態、學科和兩岸分治格局，以大歷史和國際視角探討“辛亥革命”和“建立共和”開啟了中國的歷史轉型過程，以及直至百年後的今天這個歷史轉型還沒有完結的深刻原因。

3· 研討會主題

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個主題：（1）政治變遷；（2）經濟現代化；（3）國際影響；（4）文化和知識份子。

3.1 政治變遷

第一，革命與群眾運動的變遷。辛亥革命之後，直至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和群眾運動（社會動員機制）是中國政治變遷的主要手段。廣義上的社會運動，也被稱作中國近代研究的新範式。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黨以“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來進行革命和發動群眾運動；而共產黨也以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表現出相同的政治發展範式。因此，國共兩種革命和群眾運動的範式比較，是對都自認為繼承辛亥革命傳統的兩方的一種深層理解。

第二，意識形態的變遷。民主是辛亥革命與建立共和的旨歸。無論是新舊三民主義，還是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理論上都沒有脫離以民主發展為目的的意識形態訴求，但是其表現和內容卻大相逕庭。意識形態作為政治理念的核心內容，也是本次研討會的重要內容之一。

第三，國體、政體和憲法變遷。民主國家要通過共和政體實現。何為“民國”？孫中山先生說：“民國之國家，為全國國民所公有；民國之政治，為國民所共理；民國之權利，為國民所共用。”可見，作為一種國家形式或稱政體，共和制通過權力的共用（民有）、政府的共治（民治）、利益的共贏（民享）來實現民主的落實。同時，憲法則提供了民主制度和國體的框架。然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從來不缺乏成文的各種版本的“憲法”。可是，從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及其後繼者，到蔣介石和毛澤東，均不能實踐和履行“憲法”的情況一再重複出現，以致不斷發生“合法性危機”。所以，如何擯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擺脫人治，構建制度治理的權威性，幾乎是中國長期面臨的根本性政治課題。在這方面，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相對完整，為中國未來的進一步政治轉型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第四，主要歷史人物再評價。近年來，大陸方面在重新評價過去一百年重要政治人物（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鄧小平等）方面，因為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減弱，政治立場為尺規的革命史觀趨於淡化，加之史料的發掘，頗有新的氣象。但是，大陸學術界對於辛亥革命政治主題方面的學術研究易受到當時社會政治態勢的影響的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在這次研討會上，希望呈現出一百年來重要政治人物的多元化的再認識和再評價。

3.2 經濟現代化

第一，現代化“模式”比較。市場制度，產權制度，企業制度也都是“模式”中不可忽視的要素。在這方面，中國大陸和臺灣擁有豐富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從經濟現代化擴展開來，討論政治現代化和現代化的整體進程，比較臺灣模式、中國模式和東亞模式，實質上都是對一種文化（儒家文化）能否成功轉型為現代化社會的討論。當下，是否存在“中

國模式”，如果存在，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的關係如何等問題，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亞洲和各新興市場都有重大意義。

第二，國家資本（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遷。中國的國有化發生於清末，傳統上認為，鐵路國有化政策是四川保路運動的起因並導致了辛亥革命和全國的反清浪潮。從經濟現代化的角度上看，晚清的洋務自強運動、國民政府的經濟改革以及共產黨實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都是以強化國家資本（國有經濟）的方式來力圖實現現代化國家的夢想。根據較新的研究成果看，通過國家資本（國有經濟）的演變，可以重新闡發和認識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也是理解過去一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把鑰匙。

第三，“現代化”過程中共同的基本問題。現代化是一個廣闊而深入的歷史進程，會發生一系列共同的問題，諸如“三農”和土地問題、區域現代化問題、城市化（城鎮化）問題、教育問題、科技和創新問題、金融問題、匯率問題等。

3.3 國際影響

自 1911 年以來的一百年間，世界格局的不斷變化，中國不得不調整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選擇在世界舞臺上的角色，用中國的方式與世界“融合”。離開世界的大背景，則幾乎不能解釋中國國內的革命、改革和演變。研討會的國際影響議題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對中國影響重大的國際事件。這些國際事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 年俄國布爾什維克獲得政權；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對日戰爭；韓戰和冷戰；蘇聯解體和東歐國家放棄社會主義；全球化；反恐怖主義。其中，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加速了南京民國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進程，直接導致了 1935 年的貨幣改革；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侵佔東北和中國大部領土，導致中國人民奮起抗日，中國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場”，為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和在 1949 年奪得政權提供了歷史機會；在“冷戰”的國際背景下，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成員，對抗西方世界，捲入韓戰（抗美援朝），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工業化基

礎。在“冷戰”的環境下，形成了至今還在繼續的中國大陸和臺灣關係。而中國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冷戰”的完結。

第二，中國對於國際環境變化的反應方式。總的來說，在過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與世界格局，以及與美國、日本和前蘇聯的關係，基本處於“被動”狀態，只能在“被動”前提下，調整自己位置，尋求“主動”。而中國的每一次國際關係的調整，都對內政發生劇烈衝擊和影響。其中，最值得總結的調整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選擇站在了最後勝利方的一邊；冷戰期間，中蘇分裂，中國主動突破與美國的僵化的敵對關係，為1980年代以後的改革和開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國際環境。

第三，就現代化而言，臺灣和中國大陸都極為有效地抓住了特定的國際歷史機會。臺灣成功地利用戰後亞太地區的新格局，準確處理了與美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完成向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出口主導”型經濟的過渡，成為1970年代東南亞“四小龍”之一。在1970年代末，中國利用冷戰後期的歷史機遇，實施對外開放，並用開放帶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80年代至2010年代，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2008年以後，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的影響力顯著加強。中國開始從在世界格局中的“因變數”向“引數”過渡。

3.4. 文化和知識份子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文化結構始終處於變動之中，與中國文化體系緊密聯繫的知識份子的組成和功能，幾乎是同步變動。而且，兩者互為因果。因此，在研討會中將重點討論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的演變。中國文化問題是過去一百年中討論最多和分歧最大的領域。1911年結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從此，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都構成了對中國原有文化體系的衝擊。其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提倡白話文，大量西方元素進入中國文化範疇，促成了“新文化”的崛起。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分流為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在中國大陸，受制於意識形態，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的進步基本停滯；在臺灣，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得以傳承。1980年代之後，中國文化回歸相對獨立，

有所復興，文化高度大眾化、多樣化、多元化，大陸和臺灣的文化趨於合流。希望在此次研討會中，可以在研究中國文化一百年的演變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和分流。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作為知識份子的“士大夫”階層，大體穩定。但是，在過去一百年間，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是一個穩定的群體，處於不斷分解和分裂。1920年代之後，因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民族主義的影響，在對待文化傳統、現代化道路和政治制度的選擇方面發生分歧，知識份子全面分化；在1945-1949期間，知識份子發生普遍“左傾”，加劇了國民黨政權的衰敗。在中國大陸，從1950年代至1970年代，知識份子群體被壓抑，1980年代，知識份子對歷史進步貢獻顯著，但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再次導致了知識份子徹底分化。在臺灣，“藍”“綠”紛爭與知識份子的“分裂”緊密相關。此次研討會，如果系統描繪中國知識份子長達一百年的分化和分流過程，並解讀其深刻的思想背景，會填補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沒有深入開拓的領域。

第三，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現代化在中國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但是，在文化領域中，作為一股重要的現代化推動力量的，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有的時候被稱為“公共知識份子”或者“知道分子”，以群體而論還從來沒有普遍性地自社會中自發地產生出來。個別的情況也是鳳毛麟角，而且往往以悲劇性的命運成為一種記憶而被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所自覺地回避。這種狀況不僅在大陸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在臺灣也是如此。因此，如果通過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視角，放眼一百多年來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大陸與臺灣知識份子上述狀況進行歷史性橫向對比剖析，必將發現更加普遍性的有價值的啟示。